



# 守正创新：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演变与趋向<sup>\*</sup>

□ 龚蛟腾 易凌

**摘要** 从机构视角爬梳并构建“图书馆”本土化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的重要途径。古代时期,昭显秘藏性质、突显图书对象、彰显多元特征的机构话语是“图书馆”话语形态的具体表现。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全方位的竞合导致了图书馆、藏书楼等彼此纠葛的话语格局,最终“图书馆”术语成为机构话语的主流。现代时期,信息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社会多元力量等形成的合力,促进了图书馆话语的转变、创新与交融。图书馆要实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明确话语文本的嬗变趋向、把握话语权力的代际转移、推进话语体系的特色建构。

**关键词** 图书馆 机构话语 话语发展史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6.017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检视、还原与打造“图书馆”本土化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图书馆学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sup>[1]</sup>。”近代严复亦有言:“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sup>[2]</sup>。”“名”即是科学研究中各有所指的名词、概念、术语,其代表的话语力量与实践的现实力量彼此交织,是关乎科学研究、专业教育、事业发展能否“成”的关键因素。古代刘向、刘歆开创了传统校讎学说,近代西学东渐已确立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现代信息、知识、数据范式的兴起又促成图书馆学的创新发展。以“校讎”“图书馆”“信息”等为核心的术语概念彼此纠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话语力量相互错杂,只有从中梳理出话语主线,才能更好地明确事业、研究与发展方向。作为一门具有明显机构范式特征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立足于具有社会实体的图书馆事业,因而机构视角可以作为图书馆学话语研究独到的切入点。不同的时代话语取向塑造了不同的“图书馆”机构名称,不同的“图书馆”机构名称也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话语价值。因此有必要从机构名称着手,探究“图书馆”机构话语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势。这是对“图书馆”话语的历史回望,有助于巩固学科根基与内涵,也是对“图书馆”话语的未来前瞻,有助于明

晰学科实质与趋向。

## 1 探寻古代图书馆发展的话语形态

### 1.1 昭显秘藏性质的机构话语

古代图书馆机构名称中蕴含着“图书馆”的话语基因,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机构话语。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古代通常没有使用“图书馆”词汇来指称“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sup>[3]</sup>,但这并不妨碍古代形成了包括官府、私家、书院、寺观等四大类型图书馆的事实。一言以蔽之,多元化是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核心特质,并具体表现为昭显秘藏性质与突显图书对象。机构话语昭显秘藏性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官府图书馆与寺观图书馆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不完全调查<sup>[4-27]</sup>,可以发现官府图书馆有“厂”“宀”“殿”“府”“阁”“观”“馆”“匱”“库”“楼”“庙”“室”“台”“堂”“屋”“园”“院”“藏”等多种称法(详见图1)。“××阁”“××殿”等都是官府图书馆的专称,“秘府”“秘阁”等则是用以统称的概念。自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sup>[28]</sup>之后,“秘府”成了古人对于官府图书馆的相对固定的称谓。此后无论是《晋书》<sup>[29]</sup>《隋书》<sup>[15](616)</sup>《唐会要》<sup>[16](643)</sup>《通志》<sup>[30]</sup>等史书,还是《容斋随笔》<sup>[31]</sup>《涌幢小品》<sup>[32]</sup>等笔记,都

<sup>\*</sup>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创新研究”(编号:20ATQ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龚蛟腾,ORCID:0000-0001-7765-2822,邮箱:jtgong2005@163.com。



有使用“秘府”的记载。南宋程俱《麟台故事》记载“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sup>[19][22]</sup>，此处的“秘阁”既是对魏晋时期“秘书阁”的简称，也是对宋代主要官府图书馆“秘阁”的具体反映。而且“秘阁”一词在长期使用中，逐渐脱离了具体藏书处所的限制，成为指代官府图书馆的通称。如明代虽无“秘阁”之名，但丘濬《请访求遗书奏》中仍称“秘阁所藏”<sup>[33]</sup>。并且，“秘”逐渐成为官府图书馆话语的核心，如官府馆藏称为“秘书”，管理长官与机构则为秘书监与秘书省。

寺观图书馆方面，有着道藏、佛藏等“藏书曰‘藏’”<sup>[34]</sup>的传统。在此影响下，明代曹学佺、清代周永年有着“仿二氏为儒藏”<sup>[35]</sup>的倡议与实践。此外，清代阮元还曾创建灵隐书藏与焦山书藏<sup>[36]</sup>。官府与寺观图书馆所使用的“秘”“藏”话语具有非常强烈的保守色彩，是造成古代图书馆“重藏轻用”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也正是由于其秘藏特性，大量的珍本古籍才得以在皇权羽翼下或深山隐僻中流传不绝，保存了丰厚的中华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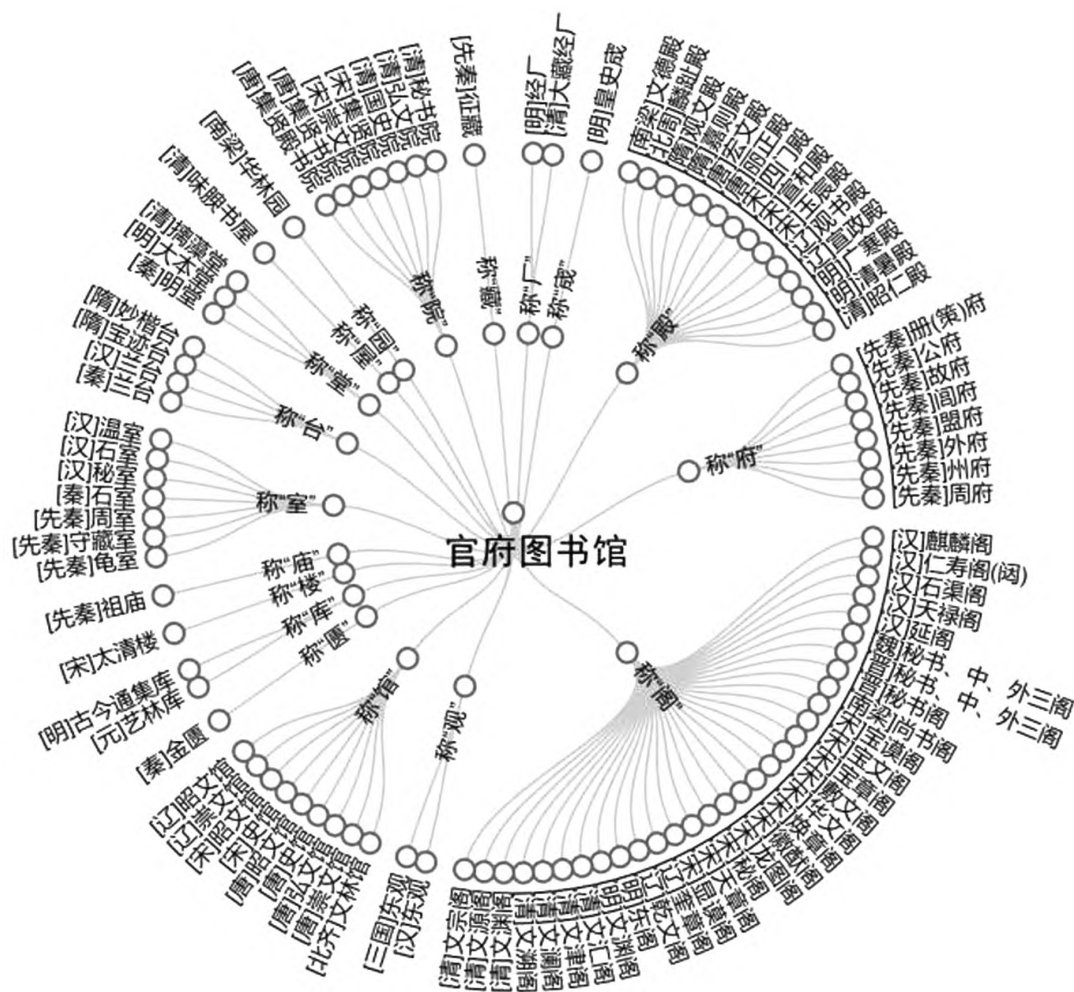


图1 历代官府图书馆名称

### 1.2 突显图书对象的机构话语

突显图书对象的机构话语特点，主要反映在私家图书馆与书院图书馆方面。由于私有属性，私家图书馆的命名与其所有者爱书、求书、藏书、校书、读书的生平有着密切关联，因而侧重于“书”这一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不完全调查<sup>[37-76]</sup>，发现私家图书馆的命名主要包括“庵”“仓”“廛”“巢”“堆”“房”“阁”

“馆”“度”“居”“库”“林”“楼”“庐”“舍”“室”“堂”“亭”“屋”“轩”“园”“藏”“斋”“庄”等等（详见图2）。私家图书馆之有专名者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史学家吴兢撰有《吴氏西斋书目》<sup>[43]</sup>，“西斋”即为吴氏图书馆之名。随着私家图书馆事业的兴盛，逐渐出现了作为通称并影响后世的“藏书楼”术语。据江向东的考证，出现于南宋曹勋《观月藏书楼》<sup>[77]</sup>一诗的





### 1.3 彰显多元特征的机构话语

官府、私家、书院、寺观图书馆所使用的名称，彰显了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多元化的核心特征。基于系统的爬梳与整理，不难发现古代对于馆阁斋楼等文献机构的存在具有统一的认识，而且在事实上可以用“图书馆”概念表示。不过古代并未使用“图书馆”词汇指称图书馆事业，甚至也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机构术语。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古代部分图书馆具有公共、公开、共享的特点，但绝大多数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封建君主、士大夫等贵族阶层为满足自身文化需求而创建的。故而古代图书馆名称多由创建者自行确定，天禄、石渠、天一、汲古等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古代对于图书馆的认识并没有具备专业化、标准化等特征的现代科学的支撑，相关术语并不是在统一规范的话语体系中形成的。不论使用“秘府”“秘阁”，还是“藏书楼”“藏书阁”，都出于古代学者的自我认知与习惯。更重要的是，以“秘”“书”等为核心的机构话语，是在重视文献典藏的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历史现实意义。并且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的形成，与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是相辅相成的。重秘藏则讲究访求与典藏，有序管理则依赖分类与编目，为求图书之原与真，就离不开校勘、辑佚、版本、辨伪，如此方能实现高质量的文献利用与流通。由此亦可见校勘、目录、版本等理论虽支撑起了完整的古代图书馆学，却缺乏有效的内容整合与体系建构。若以今论古，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与学术体系都是散漫而缺乏规范的，但在当时却有着坚实的现实条件与学术基础。如果在相对稳定的时代环境中独自发展，“藏书楼”或其他术语也许会脱颖而出，促成多元化的古代图书馆话语的统一与规范。但近代激烈的中西竞合，使得古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在近代西式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冲击下产生了剧烈变革，传统的多元化机构话语也逐渐规范并统一于西式 Library 的译称——“图书馆”。

## 2 透视近代图书馆主导的话语格局

### 2.1 晚清以前“图书馆”的名与实

从语用意义来说，作为正式术语的“图书馆”确实在晚清时期才出现。但根据文献记载，不论是语法形式上的“图书馆”词汇，还是语义内涵上西方创建的“Library”，在晚清之前都已出现在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图情老姜”<sup>[80]</sup>与张银龙<sup>[81]</sup>先后在宋

代与清代文献中发现了“图书馆”词汇。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因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一诗中，有“还从股肱郡，待诏图书馆”一句。《山谷外集诗注》中史容对此句有注解，“东壁二星，天子图书之秘府也。东坡为郡，仍直史馆”<sup>[82]</sup>。《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sup>[29]</sup>，诗中的“图书馆”实际上与指称古代官府图书馆的“秘府”是同义词。根据诗注来看，这里“图书馆”具体指的是苏轼的贴职“直史馆”中的“史馆”。清代诗人黎简亦有诗作《夏日饮书图书馆》<sup>[83]</sup>，此处的“图书馆”应是指黎简的私人书斋。而西方所创建的“Library”，在明代中后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所促成的日益密切的中西交流中，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一书的引介，使欧洲所创建的图书馆开始出现在中文世界中。书中提到，欧洲“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西班牙“瞻礼大堂”中“有书堂，阔三十步，长一百八十步，周列诸国经典书籍”<sup>[84]</sup>。此处的“书院”“书堂”就是实际的图书馆，是对英语“Library”或意大利语“Biblioteca”的译称。既神奇又真实的历史在晚清之前就为“图书馆”中文词汇与实际的西式图书馆创造了交汇的可能，只不过二者令人扼腕地擦肩而过了。而在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文明维度产生了激烈碰撞，形成了话语与现实交织缠绕而席卷一切的竞合格局。在激烈的冲突与磨合中，历史将图书馆的名与实推向统一。

### 2.2 戊戌变法前后盛行的“藏书楼”

戊戌变法前后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萌芽期，这期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用以指代图书馆(library)的词汇，其中“藏书楼”隐隐占据主流。据顾焯青的考证，清代外交官傅云龙曾在1887—1889年游历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国的日记<sup>[85]</sup>中，多次使用“图书馆”词汇，这是“近代汉语‘图书馆’一词的首次出现”<sup>[86]</sup>。《申报》相关文章则曾使用“藏书楼”<sup>[87]</sup>与“洋文书院”<sup>[88]</sup>分别指代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工部局公共图书馆的前身“Shanghai Book Club”。晚清外交家张德彝将美国纽约的图书馆称作“义书堂”<sup>[89]</sup>。郭嵩焘曾分别使用“书馆”“大书堂”“大学堂”<sup>[90]</sup>指称在英国所见的图书馆。王韬的游记中有着英国“典籍院”与日本“书籍馆”<sup>[91]</sup>的记载。郑观



应则使用过“大书院”“书籍馆”“书楼”“藏书院”<sup>[92]</sup>等作为西方“Library”的译称。在实践方面，京师同文馆建有“书阁”<sup>[93]</sup>，南洋公学拟设“图书院”<sup>[94]</sup>，各地学会多有“开大书藏”“设大藏书楼”“设格致书室”<sup>[95]</sup>等倡议。在此背景下，“藏书楼”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指代西式“Library”的术语。如李端棻认为与学校“相须而成”的数端之一便是“藏书楼”<sup>[96]</sup>。《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亦将西式图书馆称为“藏书楼”<sup>[97]</sup>。在地方开明士绅的努力之下，皖省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浙江藏书楼等一批以“藏书楼”为名的图书馆得以兴建。在时人的认识中，“藏书楼”就是“图书馆”，这从相关记述中“藏书楼”常与“书楼”“图书馆”“文库”等<sup>[98-101]</sup>混合使用就可见一斑。戊戌变法前后，“藏书楼”这一相对成熟的传统词汇凭借深厚的历史根基，在欧风美雨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并且“藏书楼”从话语走向现实，引领了近代早期西式图书馆的本土化建设，因而在图书馆机构话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2.3 清末民初“图书馆”的确立

清末民初，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术语被官方话语所接纳并认可，名实合一的“图书馆”机构话语得以正式确立。在1946年以前，日文“圖書館”的字形与传统繁体汉字“圖書館”的字形是一致的；19世纪90年代日本文部省报告逐渐采用“圖書館”<sup>[102]</sup>，推动了和制汉字“圖書館”的广泛使用。而维新人士与《时务报》等报刊媒介推动的中日交流，则促进了中文词汇“图书馆”的推广，如《时务报》1896年的《古巴岛述略》<sup>[103]</sup>一文就使用了“图书馆”一词。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通艺学堂图书馆可能是“第一个正式使用‘图书馆’名称的图书馆”<sup>[104]</sup>，而且其选用“图书馆”为名也有可能是受到《时务报》文章的影响<sup>[105]</sup>。其后浏阳秀才雷光宇创建的“常德图书馆”<sup>[106]</sup>，也是较早以“图书馆”为名的近代图书馆之一。至1904年，湖南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sup>[107]</sup>——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今湖南图书馆前身），引领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潮流，奠定了“图书馆”话语的实践基础。在官方文件中，1903年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sup>[108]</sup>将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sup>[109]</sup>与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sup>[110]</sup>所使用的“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09年，清政府学部上奏分年筹备事宜，其中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与“京师

开办图书馆”<sup>[111]</sup>等项。学部并于1910年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sup>[112]</sup>，确定了全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蓝图。由此，“图书馆”机构话语在官方认可之下正式确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着手筹设“中央图书馆”<sup>[113]</sup>，并且《通俗图书馆规程》<sup>[114]</sup>与《图书馆规程》<sup>[115]</sup>于1915年先后颁布，进一步加强了“图书馆”的话语地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图书馆”机构话语的确立并不等于所有图书馆都以“××图书馆”为名。譬如文华公书林自始至终都未曾名为“图书馆”，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策源地”<sup>[116]</sup>的历史地位。

### 2.4 民国中期以来“圖”的发展

“图书馆”机构话语确立之后，又衍生了一朵术语史上的奇葩——圖。“圖”字由杜定友所创，是“圖書館”的合体字，主要用以节省书写笔画与出版资源<sup>[117]</sup>。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议决通过了《采用“圖”新字案》<sup>[118]</sup>，推广“圖”字代替“图书馆”。《图书馆学季刊》后又两次发表学者们对于“圖”的商榷意见<sup>[119-120]</sup>，李小缘、陈伯逵、戴志骞等图书馆学家们都曾提出探讨，历史学家陈垣等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这一讨论。“圖”发明之后，对图书馆业界与学界，乃至文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苏全有的考证，民国时期至少有20种报刊2553篇文章使用了“圖”，尤其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代表的图书馆报刊的使用，“显示出图书馆界对‘圖’字认同的广泛性”<sup>[121]</sup>。“圖”字对日本图书馆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成了日本《圖》与《圖研究》期刊的创办，因而“圖”字的使用可视为“中日图书馆学的交流从单向开始转变为双向”的标志<sup>[122]</sup>。此外，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议决使用“（六博）”作为“博物馆”的合体字<sup>[123]</sup>，呼应了图书馆界的“圖”字。此后，章新民<sup>[124-125]</sup>、汤因<sup>[126]</sup>等再次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的合体字提出商榷。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以及合体字自身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除稍见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物参考资料》外，“圖”并未得到广泛使用。改革开放后，范玉民借“圖”字抨击禁锢文化的错误行径，提倡思想解放<sup>[127]</sup>。钟宁提出改“圖”为“（门书）”，以象征“藏书楼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文献信息中心”<sup>[128]</sup>。2014年，“图谋”创建了“圖人堂”<sup>[129]</sup>，吸引、凝聚了一批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为业界与学界“在新的社交方式下的学术交流建立了一个新的平台”<sup>[130]</sup>。这些讨



论与实践丰富了“图书馆”的话语意义，而“圖”兴衰沉浮的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图书馆事业与话语的发展。

### 3 解析现代图书馆转型的话语取向

#### 3.1 信息社会驱动话语转变

时代的发展必将赋予“图书馆”机构话语新的内涵，“图书馆”机构话语的转型也反映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促成了情报、信息、数据、知识、智慧等各有偏向又彼此联系的研究范式的兴起，驱动了以图书馆为核心的单一的机构话语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报”“信息”等开始融入图书馆机构话语。譬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于1985年改名为文献情报中心，下设兰州、成都、武汉三个文献情报中心<sup>[131]</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先后改名为文献情报中心、文献信息中心，再又调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sup>[132]</sup>。此外，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分别承担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国家医学图书馆职能<sup>[133-135]</sup>，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合并<sup>[136]</sup>，都体现出“图书馆”与“情报”“信息”乃至“数据”相融合的话语转变趋势。21世纪初，胡述兆先生提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sup>[137]</sup>，从资讯(Information)角度重新阐释图书馆内涵，引起了海峡两岸的积极响应。用以取代“图书馆”的“知识馆”<sup>[138]</sup>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意图以“知识”为基础打造“图书馆”话语。近年来随着AI、5G、物联网等的发展，一方面“数据驱动”“数据治理”为图书馆提供了发展新契机<sup>[139]</sup>，另一方面出现了“由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过渡和转型”<sup>[140]</sup>，数据、智慧等在“图书馆”话语体系中表现出强劲力量。不论是图书馆本身还是图书馆机构话语，都不可能漠视时代的转型而一成不变。在新时代的信息生态、数据生态中，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等不同的话语取向为图书馆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图书馆如何顺势而为实现突破与转型，是关乎生存的关键问题。

#### 3.2 公共文化引领话语创新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入，“图书馆”话语在公共文化、社会力量的引领下保持着持续的创新发展。一方面在政

府的引导下，“图书馆”话语向“公共文化”靠拢。譬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图书馆列为排名第一的“公共文化设施”<sup>[141]</sup>，《公共图书馆法》也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42]</sup>，将“图书馆”纳入官方公共文化话语体系之中。在具体实践方面，2019年初，原苏州独墅湖图书馆被纳入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sup>[143]</sup>，与文化馆、美术馆进行资源整合。北京以“政府搭台社会力量唱戏”的方式开展公共阅读空间建设<sup>[144]</sup>，这些新型阅读空间既有保持“图书馆”名称者，更有表现出多元文化创新活力的“红楼公共藏书楼”“良阅书房馆”“宸冰书坊”“北京砖读空间”等等。另一方面，民众自办图书馆展现出勃勃生机，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创建的“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收录了441条民间图书馆信息<sup>[145]</sup>。这400余家民间图书馆的命名虽以“图书馆”为主，但共使用了“图书馆”“书屋”“图书室”等43种相关机构术语，其中使用频次大于2的有19种(详见图3)。“书屋”“文化站”等明显有着农家书屋工程、文化馆建设的影响，“图书室”“阅览室”则是“图书馆”术语的相关词，此外还有“庵”“阁”“居”“楼”“斋”等传统名称错杂其间。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创办的“杂·书馆”，与之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其创建的“晓书馆”与“晓岛”。多样的民间图书馆名称，正是民间文化创新活力的突出体现。总而言之，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建设中，多元的图书馆名称展现出文化创新的蓬勃活力，体现了公共文化对于“图书馆”话语与现实的积极引领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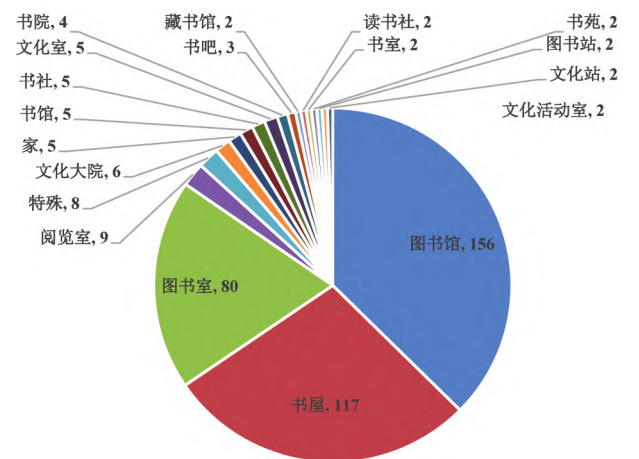


图3 民间图书馆机构术语主要类型



### 3.3 多元力量促成话语交融

“图书馆”话语在中文背景中有明显的文化内涵,彰显了“图书馆”机构的文化底蕴与文化价值。由于这种文化价值的存在,“图书馆”话语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机构范畴之内,势必受到社会多元力量的影响,形成交融发展的态势。目前的互联网络生态为各类型“图书馆”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平台。譬如“青番茄图书馆”“借书人图书馆”等等,都是依托民营企业,借助线上平台实现书目信息交流,通过快递物流实现实体图书传递。尤其是青番茄图书馆还开创了“IN LIBRARY”理念<sup>[146]</sup>,一度成为学界探讨、社会热议的重要话题。又如“豆瓣读书”,它既没有一件实体或数字的文献,也不遵循某一系统的图书分类法,但却汇聚了大量自发的书评内容,通过个性的标签建立连接,还提供各种阅读榜单与书目信息,已经具备“知识集散与知识序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不称“图书馆”的图书馆。不过衡量图书馆的关键不仅在于“知识集散与知识序化”,更重要的是作为图书馆灵魂的“公益性”<sup>[147]</sup>。很多名为“图书馆”而实非图书馆的机构,正是因为缺乏“公益性”。譬如北京超星公司旗下的“超星数字图书馆(汇雅书世界)”,纵使名为“图书馆”,但只是数据商的商业产品而已。虽然在校园、图书馆等局域网环境下可以免费使用,但实际上这是局域网所属单位购买服务之后的效果,并非其本身具有公益性。此外,“气味图书馆”也是较受关注的非图书馆机构。根据相关企业征信机构所显示的信息,“气味图书馆”是北京奕天世代商贸有限公司旗下的香水品牌<sup>[148]</sup>,仅是将“图书馆”视为一种营销手段,与实际的图书馆相去甚远。在经济、文化乃至社会治理多元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话语因为现实的交融发展产生了多种可能,“图书馆”现实也因为话语的不同价值凝聚了多元力量。

## 4 凝聚未来图书馆变革的话语力量

### 4.1 明确话语文本的嬗变趋向

要凝聚未来图书馆变革的话语力量,首先要明确“图书馆”话语文本从古至今的嬗变趋向。话语文本的生成必然来源于一定的现实环境,现实的认知也同样依赖一定的话语表达,话语与现实之间存在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图书馆”话语在长期的嬗变进程中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核心特质,而不同

的时代造就了话语文本不同的表征。“秘府”“藏书楼”“义书堂”“公书林”“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虽然有着表述上的差异,但都指向现实存在的图书馆事业。需要明确的是,“图书馆”可以作为规范的术语,也可以作为话语的核心,但将“图书馆”视为唯一的文本表述,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多元发展是“图书馆”话语嬗变的主线,求同存异是认知话语的合理方式,必须承认、尊重并保护话语的多元性。在以“秘府”“藏书楼”为代表的古代,无论是深处宫禁的皇家“秘书”,还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sup>[149]</sup>的私家藏书,都体现了“图书馆”话语的保守特性。近代时期,以民主、自由等为核心的思想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藏书楼”等逐渐被打入另册,词性中立的“图书馆”成为主流。并且随着公共、公开、共享等理念的深入人心,“图书馆”的话语核心地位愈加巩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图书馆在现实中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图书馆话语也趋向于更加包容,未来的“图书馆”话语必然会在复古、新潮、怀旧、激进等多元力量的博弈中迸发出新的生机。以多元为特质、以综合为表征的未来“图书馆”话语,将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增加“变与不变”等问题的难度。无论是事业、研究,还是教育,在未来变革中都应该采取审慎态度与稳健做法,取得“守正”与“创新”的平衡,以避免文本改变导致的话语力量崩塌,乃至现实基础受损。

### 4.2 把握话语权力的代际转移

“图书馆”话语的时代嬗变,背后隐藏着话语权力的代际转移。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话语权力的转移过程,具有明显的笼统走向规范、多元解构单一的特征。一方面,指向笼统、内涵模糊的“图书馆”传统话语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规范化。古代“图书馆”话语的立足基础是古典文言,而古典文言的笼统与模糊弊病使“图书馆”话语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这使传统“图书馆”话语在近代激烈的中西思想碰撞中难占优势,并逐渐趋于式微。一来是使用古典文言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使用白话文的近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传统话语不是被白话化改造,就是随着古典文言而沉寂于历史的角落。再者是封建农业时代向资本工业时代的转型,使古典文言让出话语舞台,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科学、民主内涵的近代话语体系占据主流地位。譬如近代学者们对于“藏书楼”概念的批判,实质上是自由开放、民主



平等思想对于保守封闭、专制等级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多元的现实基础对单一的话语体系产生了挑战，单一的“图书馆”话语权力遭受多元解构。话语权力解构的直接表现在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叫“图书馆”的图书馆和名为“图书馆”的非图书馆机构。不过这对于图书馆、图书馆学而言并非有弊无利，一来图书馆能够在顺应社会多元发展的趋向下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与发展可能，二来图书馆学可以在机构范式的基础上整合研究范畴、扩大学科领域。譬如相对逸出图书馆学范围的校雠学说，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未来的“图书馆”话语权力将走向何方？是对多元进行规训而复归于一？还是逐步解构而最终消解于无形？抑或多元与一元相互博弈而保持某种平衡？时代潮流，浩浩汤汤！前两次话语权力的转移都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结果，只有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才能明确未来“图书馆”话语何去何从。

#### 4.3 推进话语体系的特色建构

“图书馆”不仅是指代社会文献知识整序与服务机构的术语，还是图书馆学学科名称的核心，因而未来“图书馆”话语体系的建构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话语体系建构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突出特色，具体来说就是突出中国特色与专业特色。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两次话语变革，背后都有着浓厚的西方影响。一方面，西方的影响确实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并不是抛却中国自身特色与历史根基的理由。另一方面，以近代西式图书馆学对传统校雠学说产生的影响为例，这不仅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近代对于古代的影响。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错杂交织，使得后人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来路与进路产生了迷思，以至于出现了以西方的近代为近代甚至以西方的未来为未来的错误倾向，掩盖了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个性。有鉴于此，包括图书馆、图书馆学在内的各门事业与学科，都应该面向中国现实、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中国理论、打造中国学派、形成中国话语。在确立专业特色方面，一是要传承并弘扬由校勘、目录、版本等研究组成的传统校雠学说，挖掘图书馆学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底蕴，夯实“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独特基础。二是要警惕对于图书馆学机构范式的偏颇批判。机构范式确实存在局限，但同时也是机构范式的图书馆学使传统校雠学说摆脱了作为经学、

史学附庸的限制，将学科理论建筑在现实社会的图书馆事业之上，形成了以“图书馆”为核心的独立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三是必须扩大图书馆学的理论视野，立足于图书馆而不局限于图书馆。数字人文、数据科学、智慧图书馆等是图书馆学应该把握也必须把握的前沿领域，理应借此展现图书馆学的独特价值，扩大图书馆学的学科影响，发出图书馆学的专业声音。话语体系是话语力量的依归与放大器，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有效凝聚话语力量的关键。要实现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话语体系的特色建构必不可少。

#### 5 结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景下，“图书馆”机构话语从萌芽到确立再到变革的数千年发展史，都将成为未来话语体系的底蕴与基础。时代选择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来作为本门事业与学科的名称，一方面以规范的科学范式凝聚了学科共同体，造就了具有庞大能量的“图书馆”话语与现实；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信息与文化领域，机构矜域与社会视野，历史、现实与未来等诸多抉择中，左右甚至束缚了事业与学科的选择。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时期，事业与学科都将享受时代的红利。但在社会形态急剧转型时期，事业与学科也将为传统的机构范式所牵绊。因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绝不仅仅是采用某种更潮流、更完善的话语方式来阐释已有理论与问题，而是要以面向未来、走向未来为目标来重构图书馆学。既要构建起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更要保障学科与事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图书馆”作为话语体系的核心词汇，其嬗变演进的历程是话语体系发展的忠实缩影，其未来变革的趋向也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启示。当然，“图书馆”机构话语只是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话语体系也只是事业与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要实现学科与事业面向未来的更好发展，需要进行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的历史整理，需要实现更发散、更敏锐、更精细的创新突破。

####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 10: 论语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71.





- 2 严复.政治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9.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25.
- 4 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等.春秋三传[M].杜预,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2,355,423,488,493.
- 5 佚名.穆天子传[M].郭璞,注.洪颐煊,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 6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 6: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64.
- 7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 4: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29.
- 8 庄子.庄子集解[M].王先谦,集解.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77.
- 9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388,720,751.
- 10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819,822.
- 11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214.
- 12 任莉莉.七录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
- 13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6.
- 14 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60.
- 15 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614,616.
- 16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114.
- 17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63—1264,1299.
- 1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936.
- 19 程俱.麟台故事校证[M].张富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21.
- 20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2557—2559,2596,3366.
- 21 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1.
- 22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477.
- 23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90,1213,1567.
- 24 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419—422.
- 25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M].杨辉君,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15.
- 2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7,58.
- 27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4219—4220.
- 2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324.
- 29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93.
- 30 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1814.
- 31 洪迈.容斋随笔[M].穆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23.
- 32 朱国祯.涌幢小品[M].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3.
- 33 丘濬.请访求遗书奏[M]//丘濬.丘濬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3983—3990.
- 34 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81—82.
- 35 周永年.儒藏说[G].王岚,点校//胡应麟.经籍会通:外四种(第2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15.
- 36 阮元.焦山书藏记[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82—83.
- 37 王嘉.拾遗记译注[M].孟庆祥,商嫄姝,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1.
- 38 白居易.池上篇并序[M]//白居易.白香山诗集.上海:世界书局,1935:458—459.
- 39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83,3850,4281.
- 40 李昉.太平御览(第2版)[M].夏剑钦,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852.
- 41 苏轼.健为王氏书楼[M]//苏轼.苏东坡全集.邓立勋,编校.合肥:黄山书社,1997:515.
- 42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23.
- 43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00—401.
- 44 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
- 45 费衎.梁溪漫志[M].骆守中,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94.
- 46 尤袤.遂初堂书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35.
- 47 李修生.全元文:第20册[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74—276,310—312.
- 48 刘埙.隐居通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
- 49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M]//李正民.元好问研究论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52.
- 50 郑元祐.郑元祐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10,233—234.
- 51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624.
- 52 王世贞.萇竹堂记[M]//汪侗然.明代文粹.上海:世界书局,1932:90—91.
- 53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周本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3—424.
- 54 胡应麟.经籍会通[G].王岚,点校//胡应麟.经籍会通:外四种(第2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30,56.
- 55 祁承燾.澹生堂藏书训约[G].王岚,点校//胡应麟.经籍会通:外四种(第2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65.
- 56 郑元庆.吴兴藏书录[G].范锴,辑.陈晓兰,点校//胡应麟.经籍会通:外四种(第2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29.
- 57 晁瑛.徐勃.晁氏宝文堂书目 徐氏红雨楼书目[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58 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59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6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2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50,478.
- 61 陈用光.桐城派名家文集 3:陈用光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84.
- 62 查慎行.人海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63.
- 63 戴璐.藤阴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46.
- 64 吴翌凤.清朝文征[G].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144—145,457—458.
- 65 昭梿.啸亭杂录 续录[M].冬青,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1.
- 66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60—264,1065—1068.
- 67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54.
- 68 丁申.武林藏书录[G].陈晓兰,点校//胡应麟.经籍会通:外四种(第2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65,171,173,177—179,184—186,188,191—205,207—209,212—215,218—220.
- 69 王芭孙.渊雅堂全集[M].王义胜,整理.扬州:广陵书社,2016:330—331.
- 70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573—574.
- 71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36,185.



- 72 吴騫.拜经楼藏书题跋记[M].吴寿暘,辑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跋,30.
- 73 徐康.前尘梦影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叙,32.
- 7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易孟醇,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1085,1094,1236.
- 75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M].王欣夫,补正.徐鹏,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8,83,138,193-194,211,215,242,245-246,320,333,346,348,394,396,409,451,462,526,554,572,594,598-599,611-613,619,630,642,646,650,652-653,690.
- 76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G].北京:中华书局,1982;21-25,33-38,41-43,45-47,53-56,58-62.
- 77 曹勛.观月藏书楼[G]//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1172.
- 78 江向东.“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29(6):108-112.
- 79 梅曾亮.海源阁记[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55-56.
- 80 图情释怀.小考图林老姜“图书馆”之误[EB/OL].[2020-06-30].[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3873f20100f9sp.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3873f20100f9sp.html).
- 81 张银龙,赵小丹,施伟伟.“图书馆”非日源词考[J].图书馆杂志,2017,36(4):32-34.
- 82 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4[M].史容,注.上海:上海书店,1985;11.
- 83 黎简.五百四峰堂诗钞[M].梁守中,校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311.
- 84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M].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70,77.
- 85 傅云龙.傅云龙日记[M].傅训成,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12,157,212.
- 86 顾焯青.再议近代中国汉语“图书馆”一词的出现与官方确立[J].图书馆杂志,2018,37(7):10-15,9.
- 87 法国儒莲小传[N].申报,1873-04-18(3).
- 88 藏书便读[N].申报,1877-03-22(2).
- 89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M].左步青,点.米江农,校.长沙:岳麓书社,1981;61.
- 90 郭高燾.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36,377.
- 91 王韬.漫游随录 扶桑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2;118,250.
- 92 郑观应.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郑观应卷[M].任智勇,戴圆,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7,82.
- 93 佚名.同文馆书阁藏书[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85.
- 94 南洋公学.南洋公学章程(节录)[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06-107.
- 95 京师关西学会,上海强学会,保国会,等.各学会藏书楼的藏书阅书规则[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00-106.
- 96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95-99.
- 97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M].张英宇,点.张玄浩,校.长沙:岳麓书社,1982;149.
- 98 何熙年.皖省绅士开办藏书楼上王中丞公呈[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07-109.
- 99 张亨嘉.浙江藏书楼碑记[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09-110.
- 100 张謇.古越藏书楼记[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10-111.
- 101 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立案文[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118.
- 102 顾焯青.日语“図書館”词源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5):109-120.
- 103 佚名.古巴岛述略[J].古城贞吉,译.时务报,1896(6):25-27.
- 104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99.
- 105 顾焯青.通艺学堂首次使用“图书馆”之名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2):87-93.
- 106 佚名.纪常德图书馆[J].秦中官报,1903(7):35.
- 107 龚蛟腾.首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之桂冠落谁家?[J].图书馆建设,2014(6):80-82,87.
- 108 奏定大学堂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18.
- 109 京师大学堂章程(节录)[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06.
- 110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560.
- 111 学部.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折[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25-128.
- 112 学部.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28-131.
- 113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筹设中央图书馆收买古籍启事[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83.
- 114 通俗图书馆规程[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84-185.
- 115 图书馆规程[G]//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85-186.
- 116 唐秀.文华公书林研究(1910-1938)[D].武汉:湖北大学,2011;28.
- 117 杜定友.圖[J].图书馆学季刊,1927,2(1):164-167.
- 118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M].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95-96.
- 119 杜定友.“圖”新字之商榷(第二次)[J].图书馆学季刊,1929,3(4):625-627.
- 120 杜定友.“圖”新字之商榷(第三次)[J].图书馆学季刊,1931,6(2):291-294.
- 121 苏全有.“圖”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4):102-110.
- 122 范凡.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圖时代”[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4(4):35-40.
- 123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开会纪事[J].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2(1):1-11.



- 124 罗伯赐. 圖(宀物)(口術)间的关系[J]. 章新民, 译. 图书馆学季刊, 1936, 10(4): 551-564.
- 125 章新民. 美术馆三字缩写体的商榷[J]. 图书馆学季刊, 1937, 11(1): 50.
- 126 汤因. 我对于圖(宀物)(口術)三字的商榷[J]. 图书馆学季刊, 1937, 11(2): 246.
- 127 范玉民. “圖”必须四门大开[J]. 读书, 1979(2): 11-16.
- 128 钟宁. “圖”似应改作“(門书)”[J]. 图书馆杂志, 1987(4): 22.
- 129 图谋. 圖人堂 QQ 群建立[EB/OL]. [2020-07-1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3022.html>.
- 130 邱葵. 我看“圖人堂”[N]. 新华书目报, 2016-04-01(16).
- 13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 历史沿革[EB/OL]. [2020-07-12]. <http://www.las.cas.cn/gkjj/lsyg/>.
- 1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简介[EB/OL]. [2020-07-12]. [http://lib.cssn.cn/bggk/lsyg/201803/t20180327\\_4292739.shtml](http://lib.cssn.cn/bggk/lsyg/201803/t20180327_4292739.shtml).
- 13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EB/OL]. [2020-07-12]. <https://www.istic.ac.cn/isticcms/html/1/151/152/406.html>.
- 13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介绍[EB/OL]. [2020-07-12]. <http://aii.caas.net.cn/bsgk/bsjj/index.htm>.
- 13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所馆概况[EB/OL]. [2020-07-12]. <http://www.imicams.ac.cn/publish/default/sggk/>.
- 136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简介[EB/OL]. [2020-07-12]. <https://library.sh.cn/#/index/notice?id=aboutus>.
- 137 胡述兆. 为图书馆建构一个新的定义[G]//胡述兆, 王梅玲. 图书馆新定义. 台北: “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 2005: 1-7.
- 138 龚蛟腾. 浅论知识馆(图书馆)新定义[G]//胡述兆, 王梅玲. 图书馆新定义. 台北: “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 2005: 165-171.
- 139 顾立平. 数据治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机遇[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42(5): 40-56.
- 140 李玉海, 金喆, 李佳会, 等. 我国智慧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五大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2): 17-26.
- 1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EB/OL]. [2020-07-19].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880.htm](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880.htm).
- 1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 [2020-07-19]. <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5dec.shtml>.
- 143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新闻中心. 推进园区文化高质量发展 园区公共文化中心揭牌[EB/OL]. [2020-07-19]. [http://news.sipac.gov.cn/sipnews/jwhg/2019yqdt/01/201901/t20190118\\_975995.htm](http://news.sipac.gov.cn/sipnews/jwhg/2019yqdt/01/201901/t20190118_975995.htm).
- 144 刘颖, 潘启雯. 北京新型阅读空间考察报告[J]. 新阅读, 2019(4): 19-21.
- 145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课题组. 文化火种寻找之旅: 个体公民公益图书馆事迹寻访录[EB/OL]. [2020-07-13]. <http://www.mjts.org/default.asp>.
- 146 王洪波, 耿晓宁. “IN LIBRARY”和地铁图书馆跨界合作比较研究[J]. 图书馆, 2016(3): 33-40.
- 147 龚蛟腾. 图书馆概念再解析[J]. 图书与情报, 2017(1): 94-97.
- 148 天眼查. 气味图书馆—气味图书馆公司—气味图书馆竞品公司信息[EB/OL]. [2020-07-19]. <https://www.tianyancha.com/brand/b7ed8141545>.
- 149 叶盛. 慕竹堂书目[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序.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收稿日期: 2021年4月14日

修回日期: 2021年6月30日

(责任编辑: 支娟)

##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Trends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of “Library”

Gong Jiaoteng Yi Ling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by comb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local discourse system of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times, th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which revealed the nature of private collection, highlighted the object of books, and showed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was the concrete form of “lib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times, the all-roun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ed to the complex discourse pattern among “Tu Shu Guan”(term referring to modern library), “Cang Shu Lou”(term referring to traditional library) and other terms, and eventually the term “Tu Shu Guan”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of “library”.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joi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public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multiple social forces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ibrary discours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ing the future, libraries need to make clear the transmutation trend of discourse text, appreci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discourse power, and promote the special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Library;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Discourse History